壯烈犧牲那段經歷的證明材料，表揚了鄧先玉在香港掩護我們的正義熱情和難忘的友誼。他來信說，他曾被評為模範黨員，現已離休，定居廣州，參與文史工作。每逢新年，他均寄賀卡向我問候。我後來客居袁溥之大姐家中時，他和愛侶黃成曾專程來訪。故人有後，開花結果，殊堪欣慰，附帶在此作一交代。我還知道，1950 年他的堂兄陳策將軍對於解放軍渡海作戰解放海南島曾有所支援。他在來信中也曾告訴我，陳策之弟在海南島曾任省政協副主席。

七、義救羣賢

1939 年，劉少文傳達周公指示，說服陳志皋接受了中賑會的工作。在志皋準備赴任之前，少文和我們一起準備工作班底，建議調潘達（大成）任專員，調王揆生任福建辦事處主任，我大弟伯沛（彰傳）任曲江辦事處主任，調張以璘任出納組長，大弟婦張浩然任會計組長，高伯時任總務組長。潘達、高伯時均是國際第一收容所的老同事。張以璘跟我們工作已七年了，為人謹慎，廉潔奉公，是極可靠的。又調了本是家中服務員的趙天民任庶務，歸高伯時總務組。趙天民為人忠實勤勞，參加過送機密信件，且和阿英手下陳紹賢一起包裝過八個大書箱送往後方，又在我家多年，雖然我們接待的客人眾多，但他已知阿英、劉少文、于伶等均抗日合作的要人，況且也被阿英賞識，將他調來當工作人員，亦因材任用。事實證明，少文、阿英深所欣賞的這幾位工作人員，確實能同患難、共甘苦，又能守口如瓶，共同應付了 1942—1944 年的考驗。

1942 年 1 月中旬，我攜孩子們跟着志皋等一行人到了曲江之後，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的夫人吳菊芳在勵志社設宴為我們接風洗塵。

我到曲江後，就向志皋詢問那個通知我離港的「翻譯」的事，才知道香港陷落後，日軍封鎖香港至九龍的海面交通，瘋狂搜捕愛國抗日人

◎ 1941 年，陳志皋與國際第一收容所同事攝於曲江
前排：陳志皋（中）、黃彰傳（左）；
後排右：高伯時

士，在香港具有重要影響的愛國人士及其家屬數百人陷入危境，劉少文受命盡力營救，志皋也接受了任務。我告訴他，在路上曾遇見一位熱心助人的黃老太，他的兩個兒子是東江游擊隊員，護送我們避過日軍崗哨，得以平安通過敵佔區的情況。他說，他早就跟東江游擊隊有了聯繫，正在想法子派人去香港，在東江游擊隊的協助和保護下，把香港淪陷後困在那裏的各界知名抗日愛國人士搶救出來，為此，他已給中賑會委員長許世英打過電報，說是正在打算營救被困在香港的以何香凝為首的各黨派知名人士，他已組訓了一批青年幹部，正積極商議佈置有關的工作。當時，中賑會已在從曲江到日佔區沿途的各縣設立了救濟站和接待站。對於一般的難民，由救濟站負責安排。因為廣東的氣候溫暖，所以各救濟站就用竹子搭起大棚子，作為過往難民的臨時宿舍。每人每天發給兩塊錢作為生活費，到了下一站再繼續發放。接待站負責接待由中賑會派去香港迎接護送到大後方的、社會地位較高的特殊難民，條件自然要好得多。

這時，上海抗戰中曾以童子軍抗日後援會的名義，代表數百萬上海租界民眾泅渡蘇州河，向謝晉元將軍和堅守在四行倉庫裏里的八百壯士獻旗慰問致敬而名揚一時的楊惠敏，也流亡到了曲江，前來請求安排她參加抗日救亡工作。我保舉她帶人潛往香港，去執行營救知名愛國人士的任務。

正好上海銀行界也要派專員李桐村、趙樂天潛入香港，搶運留在香港的大量物資回大後方，他們到曲江來見志皋，請求協助。於是楊惠敏就和他們一起，帶了幾個年輕力壯而又有經驗的賑委會工作人員赴港。我為楊惠敏送行時，向她詳談了自己從香港一路流亡到曲江的情況，還特地備了一份禮物，囑她代為轉送給那位讓兒子護送我們的黃老太太，請他們繼續發揚愛國愛同胞的精神，支持我們的特殊救濟工作；還特別叮嚀她，首先要搶救護送的是何香凝老前輩。我對楊說，我保舉你擔此重任，是因你當年在上海表現英勇，是對你的愛國精神充分信任，相信你必能完成這一光榮任務。此去有志皋給你寫的中賑委特派委員的介紹信，在途中若見到東江游擊隊的同志們，定會得到他們的支持合作。她唯唯應諾，表示一定克服各種困難，堅決完成搶救護送任務，請我放心。果然，他們在東江游擊隊的支持協助下，首戰告捷，把何香凝老人從香港平安地接回來了；還派人把林庚白烈士的女兒和部分遺稿送到曲江，報告了林庚白犧牲的噩耗及其遺孀林北麗因手臂受傷已送往醫院治療，待康復後再行護送回後方等有關情況。抗戰勝利後，我和朱立波母女重逢話舊，才知道 12 月 19 日晚，林庚白是從我家後門悄悄外出，被駐守天文台的日軍疑為「奸細」，開槍射殺於路旁，時年四十五歲啊！倉促求棺不得，只好用棉被裹體，草草葬於我家對面的菜圃中，並留下記號，以便日後遷葬辨認。林北麗手臂受傷，亦賴朱立波幫助，才不至流血過多。此事發生時，我正帶了兩個女兒在向曲江流亡途中，重慶卻已有訛傳，說我亦同時遇難了。駱劍冰聞此訊，就化名寫了悼念文章在《新華日報》副刊上發表。她後來告訴我，周恩來同志還親自在文稿上加了幾筆，予以修正補充。一個人能在生前得知有領導和戰友撰文進行深切的悼念，怎不令人感動，視為殊榮呢？抗戰勝利後，林庚白的遺骸遷葬於上海萬國公墓，由柳亞子先生主持追悼儀式，報紙上稱他為南社愛國詩人、國殤的光榮。

何香凝當時五十多歲，但腿腳有病走動不便，很早就用手杖撐着走路，從香港到曲江的路上，有船乘船，沒船就用兩根竹竿抬一把藤椅做轎

子，一路風塵勞累。到達惠陽時，志皋親自趕去迎接。她老人家一下轎就歎息說：「唉，我不能花費國家的錢來照顧我，我要畫畫義賣，和你們一起共同來救濟難民同胞！」到曲江後，她只休息了兩天，就揮筆作畫舉行義賣。我給她的畫都標了很高的賣價。廣東的高級將領如余漢謀等，當年在黃浦軍校裏都是廖仲愷先生的學生，因此對於廖夫人為義賣而作的畫，即使標價很高，也都爭相認購，一來表示對廖先生夫婦的尊敬和紀念，二來也算是為救濟抗日難胞聊表一番心意，所以這次義賣影響很大，非常成功。何香凝當場還畫了一幅紅梅圖送給我們，題款上寫着「志皋先生、定慧夫人留念」等字樣。這是件很珍貴的紀念文物，一直由張以璘同志給我保存着，後來帶回上海家中，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才失去，真是可惜！義賣活動後，我又專程護送何香凝從曲江到廣西桂林，由李宗仁、郭德潔夫婦接待。何老後來又從桂林轉去重慶。

在曲江接待從上海經香港到大後方去的文化界人士時，志皋對左翼文化界的友人是特殊優待的。田漢和蔡叔厚等一行從西江而行，先打了一個電報給志皋，志皋馬上就匯了一筆路費給他們，並回了電報予以慰問。于伶從曲江去大後方時，志皋給他預備了一條供他單獨使用的小船，還在衡陽買了二十條鴨絨被，慰勞流亡的知名人士，其中一條就送給了于伶，並贈送了路費。

在曲江，天天有敵機來轟炸。一大早，家家戶戶就煮好當天的飯菜，一聽敵機來襲的警報，大家都往郊外跑，在小山谷或樹林裏隱蔽起來；也有些人坐上小船躲在江邊的樹陰下。志皋為了接待這些知名人士，造了一條比較大的船，取名「海閣」。這條木船有兩層樓，樓下一層做卧房，樓上做餐廳，可以擺兩桌酒席。很多路過曲江的國民政府高級官員，也在這船上受到過志皋的接待。在通常情況下，我是不出面去應酬這些人士的。後來有人批評他，說他浪費國家的錢財。但事實上，這種接待方式，確實比住旅館既安全又節省。

現在從台灣到香港和大陸來的老人們中，有些人還記得當年在曲江時

那一段經歷，他們說：從香港到曲江、桂林、重慶，途中都有中賑會的接待站負責照應，其中就數在廣東曲江這段照顧得最好，吃的、住的、行的都有人妥為安排。在曲江三年的賑濟工作，志皋確實是兢兢業業、以身作則、認真負責、忍辱負重的。他與工作人員同甘共苦，對遭到轟炸而家破人亡或逃難流亡的同胞，救死扶傷。每當轟炸警報一解除，他就立即馳赴被炸現場親臨指揮，組織營救，從而在工作人員中起到了以身作則、團結大家一起刻苦工作的示範作用。他所接待的貴賓，都是按照規定，動用的是一筆特殊的接待費，絕對沒有超出規定的奢靡現象。至於接待大量的一般難民，也總是按照規定，給他們安排食宿，再發給足夠的路費，決無從中剋扣以飽私囊的行為，這是當時為許多人有目共睹的。

第九戰區賑委會在曲江招了一批失學的流亡青年學生，培訓他們成為各地難民救濟站的工作人員。要求他們認識到，為難民同胞服務，也是為支援祖國抗戰做貢獻，決不可以抱有恩賜觀點。同時講明，在接待難胞的過程中，不僅要做好供給食宿的後勤服務工作，還要向難胞們宣傳自力更生回鄉重建家園，使他們的精神振作起來，減輕他們顛沛流離的痛苦心情。賑委會還對每個工作人員進行了短期的軍事訓練和簡單自救療傷常識的訓練，以適應戰備的需要。這些青年都有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多數人家境貧寒，具有「天下窮人是一家」的互幫互助的同情心，他們的工作態度很好，使各地流亡的難胞感受到賓至如歸的溫暖。曲江雖地處敵後，但在這裏工作和生活的艱苦卻不亞於前線。在賑委會各救濟站的這些青年工作人員，發揮愛國情懷，經受嚴酷鍛煉，成為他們人生征途上難忘的重要一站。

後來看到文獻資料才得知，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中共中央分別致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等，指示與英、美等國建立廣泛的真誠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撤退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黨的工作人員。周恩來兩次致電廖承志，對撤退在港人員提出意見。在廖承志的主持下，研究決定，讓劉少文留港負責轉移工作。據統計，從當年 12 月至次年 5 月，分別從香港四個出口撤離的進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有八百人之多，還接應了兩千多名愛國青年回國參加抗日工作。曲江為粵北重鎮，是廣東省通往廣西、湖南、江西的交通樞紐，加之志皋擁有人力、物力的優勢，又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和責任心，所以相當多的人士離開香港後，是途經曲江再分赴桂林或重慶等地的。整個撤離行程萬里，足跡遍佈十一個省市。茅盾稱之為「規模宏大的」，「是抗戰中（簡直可以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我們有幸在劉少文領導下，以賑委會名義，派遣工作組潛入日軍佔領下的香港，在東江游擊隊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先後多次把被困在香港的許多各界知名愛國人士，包括國共兩黨的不少有重要影響的人士，如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茅盾、田漢、夏衍、金山以及孫科之生母等等，還包括當時的港督和美、蘇援華的飛行員等國際人士，平安地護送到大後方，盡心盡力地參與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搶救羣賢工作。

中央賑委會的副委員長屈映光（字文六，浙江臨海人，1916 年曾任代理浙江都督）到曲江視察工作時，曾給志皋的工作很好的評價。屈還和賑委會在曲江的工作人員一起合影留念。我大弟與張浩然夫婦也參加了合影。「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造反派發現了這張照片，見照片背景上有國民黨的黨徽和黨旗，賑委會的工作人員都穿着國民黨的軍服，竟將張當作「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批鬥，並將全家下放。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張浩然始得平反。

我們在曲江的這個特殊崗位上，盡力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夫婦合作得很好，工作開展得很有聲勢。吳菊芳在曲江創辦了一個生產自救性質的流亡子弟學校及婦女生產合作社，避開不時來襲的敵機轟炸的危險，隱蔽在叢林中不停工地生產毛巾、襪子、背心等軍用品供應前線。我到那裏參觀時，看到一切都組織得有條不紊，洋溢着艱苦樸素、自力更生的精神，立即明白那裏一定有我們地下黨的同志在發揮着核心領導的作用。後來才知道，果然是區夢覺同志在那裏起了很大作用。我和夢覺在北伐戰爭時期曾經見過面，一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我的錯案平反後，才和她重新見了面。抗戰時，我曾在《廣東婦女》雜誌上發表過三篇文章：一篇是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的，一篇是悼念蔡叔厚的第二位夫人朱文央的，她是以救國會民主人士的名義參力抗日救亡活動的，在上海曾參加過婦女救濟會的工作，文筆很不錯，再一篇就是記述參觀那個廣東婦女生產自救社的感受，說廣東的婦女一貫勤勞勇敢，能與男人並肩勞動，抬轎子、下田幹農活等一應重體力勞動，都有婦女參加，如今又在抗日的烽火中發揚生產自救的精神，在敵機的轟炸聲中堅持不廢生產，既支援了前線，又維持了自己的生計，這種精神是很值得學習和發揚的。

八、面謁周公

陳志皋聽到了一些誹謗性的流言蜚語，說他浪費國家財產，招待過往的達官貴人。我也因在香港期間經常出入於杜月笙的公館，被人說成是杜的女弟子……因此，志皋認為我們奉黨的指示和委託，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拚命地工作，卻還要這樣蒙冤受氣，感到很是委屈，就不想在曲江再幹下去了。正好，他在上海震旦大學的同學徐景微在交通銀行任設計處長，想邀請志皋去當副處長，而交行的董事長錢新之，也是我們在上海時就認識的。考慮再三，志皋就想向中賑委提出辭職，讓我帶兩個女兒，以探親為名到重慶去試探一下有否可能。我和母親已有多年未見面了，能有這個機會去千里探母，自然大喜而欣然同意。於是就從曲江乘火車轉道桂林，再改乘飛機抵達「陪都」重慶。事先已由志皋聯繫好，在重慶下榻於中賑會副委員長屈映光的公館裏。當晚，就接到鄧穎超大姐打來的電話：「慕蘭，你來了，明天上午伍豪要見你，我們會派車去接你，到我們這裏來吃中飯。」我問她可不可以帶兩個孩子同去，她說可以，要我第二天上午在飛機場門口等車。當晚，我躺在牀上幾乎終宵輾轉難眠，屈指算來，已有

十一年沒有當面聆聽恩來、穎超兩位領導的親切教誨了，兩個女兒也獲得了跟隨謁見的榮幸，但與宛、賀遺孤卻不知何日才能團聚。這許多年來自己經受了種種誤解委屈，明天是不是應在老領導面前訴訴苦呢……第二天一早趕緊起牀，帶了兩個女兒，按照鄧大姐在電話裏的指示，步行到飛機場附近（對屈映光說是去看望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即見到已預告車牌號碼的一輛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專用的小汽車在那裏等着了。司機同志禮貌周到，熱情地招呼我母女上車，直駛抵曾家巖「八辦」。在那裏見到了穿着軍裝的周恩來同志，他依然春風滿面，但經歷過十一年為革命事業不息地奔波操勞，已非當年容貌，並留有鬍子。鄧大姐和祕書把兩個孩子領到別處去玩，恩來同志就在他的書房（兼卧室）和我進行單獨談話。我先簡要地彙報了這些年來的工作情況。他說：「這些事劉少文都已彙報過。從1931年以來，你先後與潘漢年、吳德峰、劉伯垂夫婦保持聯繫，按照黨的指示和要求所做的一切工作，我們都早已知道了。中央知道你們的工作有很大成績，敵後工作是很困難的，你們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能盡職，能保密，又能有所創造，還能建立和發展黨的地下交通工作，營救、迎接這麼多的各界知名愛國人士回到後方來參加抗戰，對大量普通難民的救濟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是很不容易的。我代表中央向你表示慰勞，更要表揚和感謝陳志皋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我聽到恩來同志代表黨組織如此親切的溫語慰問，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心中感到無比的寬慰。

恩來同志又關懷地說：「中央知道你心中牽掛着宛、賀兩位先烈的遺孤。你曾去過澳門，已見過盧家撫養的賀昌烈士的遺孤，聽說盧彪同志一家對孩子十分疼愛，孩子很聰明，學習用功，你應該可以放心了。至於宛希儼烈士的孩子，董老曾託北伐時期的老戰友張篤倫去問過孩子的叔父，轉達中央想送他去蘇聯學習的打算。他叔父宛希侃說，蘇聯現在正進行抵抗德國法西斯侵略的衛國戰爭，生活比我們還要艱苦，孩子還小，去蘇聯的事還是過些時候再說吧。他現在正在重慶讀書，很聰明，在這裏就近有親人照顧，這次雖然可能見不上面，你也儘管可以放心的。我們大家都要

記住『土豹子』的遺言：『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我們中國的抗日戰爭，現在已進入最艱苦的相持階段。曲江，是東南沿海地區與西南大後方聯繫的重要交通樞紐。你們現在和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夫婦合作得很融洽，對國共合作堅持抗戰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我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已有很大發展，在全國建立了十四個敵後抗日根據地，只等待着反攻的時機到來，必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聽說陳志皋這次讓你來重慶住在屈映光家裏，是想辭去曲江的賑委會工作，轉到交通銀行去任職。我們的意見，還是不要辭職的好。陳志皋現在的這個崗位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人能佔領這樣一個崗位，是很不容易的。」接着還談了一些希望志皋利用其官方的合法身份，祕密支持東江游擊縱隊，給予儘可能的物資方面——包括用中賑委的特別救濟費——的支持等具體的工作任務。我說，志皋辭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聽到很多關於我們的流言蜚語，他覺得吃力不討好，有口難辯，心裏很委屈。聽到這裏，恩來同志哈哈大笑，說：「你應該勸陳志皋，為了爭取抗日戰爭早日勝利這一全民族的頭等大事，一定要忍辱負重，勉為其難，繼續努力，任勞任怨地堅守這個重要的崗位。白區工作既艱苦複雜又很危險，調動幹部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為什麼要去計較那些不了解真實情況的人所散佈的流言蜚語呢？我們希望陳志皋在曲江這個重要崗位上，進一步發揮報國的才幹，千萬不要聽到一些閒言碎語就打退堂鼓，不干了。我們要學習大禹聞善言則拜之的精神，虛懷若谷，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忍人之不能忍，容人之不能容。我們的黨和軍隊，不就是在敵人無數次誣衊、謾罵、屠殺、『圍剿』中日益發展壯大的嗎？」

我說：「皖南事變後，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四位愛國民主人士要聯合發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宣言時，還有人說我附和杜月笙要去阻攔他們發表。」恩來同志說：「宋慶齡還在香港時，小超（鄧大姐）去香港向那些支持我們黨團結抗日主張的朋友們道謝，杜月笙也請過她的客，當時你還做過陪客。這些幫會頭子只要堅持抗日，也是我們爭取團結的對象。你是互濟會的營救部長，宋慶齡先生等要發表聲明，痛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暴行，呼籲營救新四軍葉挺軍長，慰問受難同志的家屬，你怎麼會去阻撓他們呢？這些事情我們都是完全知道的，你有什麼必要聽信這些謠言而生氣呢？你幾次要求到延安去，我們都未同意，難道只有調到延安去，才是革命工作嗎？在白區工作，只有比在延安更艱苦和危險。曲江方面我們不想再增派幹部，有你在那裏已經能獨當一面了。李漢魂夫婦那裏，我們已派有專人在那裏工作着，你們仍以現在的工作方式同他們團結合作為宜，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你必須以大局為重，即使個人感到委屈，也要勉為其難，儘快返回曲江，對內傳達黨的嘉獎表彰，勉勵我們的同志，加強團結，努力工作；對外呢，一定要說服陳志皋打消辭職的念頭，堅守現在的崗位。交通銀行那裏也不一定能發揮他的才幹，我估計中賑委的許世英、屈映光他們也不會同意他辭職的。而我們的人已經佔領的崗位，也決不允許就這樣輕易地放棄，否則豈不等於做逃兵了嗎？你現在的工作位置這麼重要，誰能去接替你呢？一切服從工作需要，這是黨的紀律，你是懂得的。中央對你們是深信不疑的，總是不斷地鼓勵、表揚你們，為什麼還是不安心於白區工作呢？」

我欲言又止地囁嚅着說：「我想去延安，不僅是想離開白區，換個工作環境，還因為我想離開陳家，覺得還是跟陳志皋分手為好。」恩來同志關切地問：「陳志皋不是為我們黨做了很多工作，表現很好嗎？你為什麼要離開他呢？」我流着淚說：「雖然在這抗日國難期間，陳家這個大家庭的各位成員，都能摒棄政見的分歧，和衷共濟地團結在愛國抗日的旗幟下。但這些年來，我在他家中一直沒有公開過自己的真實身份，內心難安。我並不要求陳志皋專心愛我……」在恩來同志追問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之後，我終於支支吾吾地說出傳聞陳志皋跟某某女士有較為親密關係的事。恩來同志說：「對旁人傳說的風言風語你不可隨便輕信。」還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說：「姑奶奶，難道你也會為這種事吃醋了嗎？我們共產黨員的肚量要放得大一點，眼光要看得高一點、遠一點。民主人士即使有過那麼一段羅曼史，有時恐怕也是出於社交工作方面的需要，逢場作戲而已，在這方面對黨外

人士不應苛求。你一直在特殊的崗位上獨立自主地工作，陳志皋對你十分尊重，言聽計從，從不干預你的活動，你還能要求他怎麼樣呢？你的心胸一定要開闊一些，一切以大局為重，不要去計較這些生活上的小事情了。」在恩來同志親切耐心的諄諄教海下，我終於不得不心服口服了。

蔡叔厚本是共產國際情報系統下的一個共產黨員，我在上海時就知道了他的身份。他在上海跟劉少文、李南香等一起搞白區工作時，知道我和劉少文可以通過單線聯繫的渠道向周恩來同志反映情況。有一次閒談，他就跟我講，他是國際支部的人，想轉為中國支部的成員。這次在曾家巖見到恩來同志，我就有機會替他反映了這一願望。恩來同志說：現在還是維持原狀，保持單線聯繫比較好。提到蔡叔厚的問題，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問題：現在除了僅有的幾位上級領導同志以外，我的中共黨員身份未公開，又加上有這麼多的流言蜚語，將來我的黨籍、黨齡會不會成問題呢？於是就說出了自己心中的這一顧慮。恩來同志當即明確地回答我說：「等我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後，我會負責給你證明的！」聽了他這樣的擔保，長期以來盤旋在我心中的疑團也就煙消雲散。

要談的話很多，恩來同志想了解的事情也很多，我驚異他對許多事情記憶之清晰細緻。歡愉中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一上午很快就過去了。中午，在小餐廳吃飯，餐廳中只有一個八仙桌，就和他們的書房兼卧室一樣簡單、樸素，但是整潔、大方，全無一樣多餘的裝飾。席間，廖夢醒同志也在座作陪。菜肴中有一尾大鯉魚，鄧大姐說：「慕蘭啊，今天這是特地為你準備的呀！你知道在重慶我們是很難吃到的。」恩來同志慈祥地讓孩子們稱他為舅舅，摸了摸允中的頭說：「嗨！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長大以後一定很聰明。慕蘭，你的種子是優質的，你生的孩子一定個個都是很聰明的。」餐後水果是西瓜，恩來「舅舅」見孩子們很愛吃，又讓人拿來個大西瓜，給孩子們帶回去。還風趣地對我說：「慕蘭，你可不要丟了西瓜揀芝麻啊！」我知道他是一語雙關，提醒我不能因個人委屈而放棄重要工作崗位，連忙稱謝。二女大中那時年歲還小，對當時情景已記不清楚了；允

中對那次榮幸的覲見，至今仍留有很深的印象。席間，廖夢醒一再向我道謝，感謝我們迎救其母親回到大後方。我說：「這是我應盡的責任，你的媽媽不就是我的媽媽嗎？」從那以後，我對何香凝老人就尊稱為廖媽媽了。

從曾家巖「八辦」歸來，我思緒萬千。曾有多少次，我向組織上提出要求，要到我久已嚮往的革命聖地延安參加戰鬥，但總是未獲批准，總是說服我安心在白區搞地下工作。經過周恩來同志一番語重心長的談話，我對黨的指示進一步理解了。正如周恩來同志親切地啟示我說的：「難道只有調到延安去，才是革命工作嗎？」在白區工作，同在延安工作一樣，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工作，由於崗位的不同，更需要發揮各自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黨組織把我放在這樣一個特殊崗位上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我肩上的擔子是很重的，任務也是很光榮的。我不畏做地下工作的困難和艱險，又何必計較個人的得失呢？在隱蔽戰線上做營救工作、情報工作、統戰工作，接觸的工作對象極其廣泛，尤其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之間相互有聯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愛國民主運動正在興起。我們共產黨員為了孤立敵人，掩護革命活動，就要善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抗日，就要把公開的活動和祕密的工作巧妙地結合起來，靈活機智地在錯綜複雜的形勢下完成黨交代的任務。基於這種特殊情況，對於一些流言蜚語，一些人包括同志的誤解，我只要深知自己是本着對黨忠誠的信念和勇於負責的精神在工作，就會問心無愧，就會不予計較，就會從以大局為重的思想認識高度忍受頂住，把個人的委屈默默嚥下。想通了這一點，我感到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奉獻精神得到了昇華。

我打消了來時的念頭，帶了兩個女兒回到屈映光家裏後，當然絕口不提去曾家巖的事。我跟屈映光說了志皋想辭職到交通銀行去工作的事。屈說：「你們在曲江的工作做得很好，許世英委員長還準備替你們慶功呢！陳志皋何必跑到重慶來，去交通銀行當一個副處長呢？重慶也整天在敵機轟炸的威脅下，人心惶惶的。這裏不一定比在曲江更能發揮他的才能呢！」過了幾天是許世英的六十大壽，我跟着屈映光到歌樂山參加為許世英祝壽

的宴會，許世英已從屈映光那裏得知志皋想辭職的事，特意當眾表揚了志皋在曲江的工作成績，並且明確表示，不同意他辭職，希望我回去勸勸他。果然不出恩來同志之所料。

我到重慶去，對外說是來探望媽媽的，所以公事完畢後，就名正言順地接了媽媽到南溫泉去小住了幾天。我和媽媽見面後，告訴了老人家我們原先的打算，以及周恩來同志的指示，說本來以為如能調到重慶來工作，就可以經常和她老人家見面，略盡一點做女兒的孝道，不想如意算盤落空，很快又要回曲江去了。媽媽關切地詢問了大弟夫婦在曲江的情況，得知他們一切都好，也就放心了。她也勸我們還是要以大局為重，返回曲江，跟志皋一起堅守崗位，同赴國難，還說重慶因為經常遭受日機狂轟濫炸，很不安全，她也要隨三弟搬家去宜賓了，連四弟所在的歷史研究院也準備搬到那裏去呢。我媽媽和陳老太太一樣，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一天到晚唸經，祈求觀世音菩薩保佑活着的親人們平安，為死難的人超度，祈求世界太平。我父親沒有兄弟姐妹，所以母親不像陳老太太要為操持一個大家庭而耗勞心力。母親一生很勤儉，家裏積蓄下來的錢，都用來培養幾個弟妹上學。她在重慶定居下來後，有幾位弟妹就近照顧，我雖與媽媽已多年未見，但也比較放心了。告別母親後，我們就從重慶坐飛機到桂林，再轉道返回曲江。這是 1942 年夏天的事。

我返回曲江後，向志皋傳達恩來同志對他的勉慰和諄諄囑託與厚望，志皋深感恩來同志知人之明，信任之深，並有圖報之切的強烈反應。當時，許多工作隊的同志都很喜歡我的兩個女兒，看到她們出遠門回來都很高興，紛紛問她們重慶好不好，見到些什麼人，等等。孩子們天真地回答：「重慶很好，洗澡的水都是熱的（溫泉嘛！）。見到了外婆和舅舅，舅舅還請我們吃西瓜呢！」恩來同志讓孩子叫他舅舅，真是想得周到：一來讓我安心在白區工作，黨永遠是我的娘家人；二來童言無忌，以舅舅相稱，也避免泄密。

這時，楊惠敏仍冒着危險在香港從事祕密營救接運困滯香港的各界愛

國人士的工作，把一批又一批的人員和物資從香港護送回大後方。10 月間，志皋怕她在香港活動時間久了，難免會有暴露被捕的危險，就打電報祕密通知她即速回來，打算另行派遣工作隊去接替她。可她卻抱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態度，堅持要在香港冒險繼續工作，要護送著名的「電影皇后」胡蝶夫婦一行及隨身攜帶的大量行李，從香港到曲江再另行轉道去重慶。11 月的時候，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聲已安全到達曲江。有一天，她突然前來找我們，說是她託交楊惠敏代為護運的大批「行李」在途中不見了，要陳志皋負責賠償。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胡蝶交付楊惠敏護運的「行李」，竟有二十一件大箱大包。他們夫妻二人在逃難途中，哪會帶這麼多的行李呢？其實這些「行李」之中，只有幾件是真正的行李，絕大部分都是幫會頭子的闊太太們和國民黨高官的小老婆託胡蝶捎帶的高級走私物資，諸如後方緊缺昂貴的進口西藥、化妝品等，這些東西在香港購買並不貴，如能運到重慶出售，是很受歡迎的暢銷貨，可以從中大獲暴利。楊惠敏見要護運的行李太多，為了保證人員和貨物的安全，決定把人與行李分開來走，結果人員雖然平安到達，但這批「行李」卻因為太招人注意，被一幫土匪搶去了。當時，港九和珠江三角洲已經淪陷，就在淪陷區與廣東後方地區交界的三岔路口，日軍經常前來侵擾，也有我們黨領導的東江游擊隊在活動，更有形形色色的土匪歹徒專門在這二帶搶劫難民們的錢財。這批「行李」就是在這三岔路口被劫的。在胡蝶來訪之前，我們已聽取了護送的工作人員彙報，志皋早已發出電報，要有關人員在沿途設法追查。胡蝶可能因為別人託她捎帶的貨物在途中丟失，無法向對方交待，情急之下，說話很不客氣，一口咬定要志皋負責賠償。志皋也就不客氣地回答她說：「我們賑委會的工作人員冒着生命危險，是盡義務接運護送你們從淪陷區到大後方去的，又不是開保險公司的。你們的人員都已安全護送到了，行李在路上被土匪搶了去，怎麼能叫我們賠償呢？從法律責任上講，我們也只有代為追查的責任，要我們賠償是根本不可能的。」兩個人脣槍舌劍針鋒相對地吵了起來，當場就搞僵了。胡蝶見未能遂願，就恃悻而去。過

了一些日子，搶劫行李的歹徒把這批貨物運到桂林脱手，在市場上公開出賣。那些走私的西藥等貨物，是無法從中辨認其物主的。可是其中有一件是胡蝶自己穿的貂皮大衣，被辨認出是胡蝶的衣物，知道是贓物，但銷贓的歹徒拿到錢後，早就溜了。被搶去的那批走私貨物哪裏還追得回來？社會上廣為流傳，她因代人捎帶的貨物被劫，在那些闊太太們面前大大地丟了臉，竟遷怒到我們頭上。胡蝶到重慶後向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告了狀，説是我們包庇楊惠敏，「私通共產黨的東江游擊隊」，搶劫了她的「行李」。於是，楊惠敏被捕入獄。這真是飛來橫禍，天大的冤枉，而由此又「追查」到志皋和我，更是意外之災。但是事後仔細分析，卻也並不奇怪，想必是我和志皋在曲江以賑委會的名義做了許多有利於加強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特別是軍統特務們的注意和忌恨。我的重慶曾家巖之行，自然更加深了他們的猜疑，只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政治氣候下，他們找不到藉口，抓不住把柄，而苦於無法下手。如今正好藉着胡蝶的告狀，就可以「師出有名」地對我們下手了。所以，表面上看，我們是受到了楊惠敏的牽連，其實是軍統方面「醉翁之意不在酒」，打擊我們，中傷中共，破壞團結抗日。楊惠敏這場冤枉官司，既因胡蝶誣告了她，説不定還是因為我們的事而牽連了她，真是冤而又冤了！至於我們這場牢獄之災，就軍統特務方面而言，正所謂是惡毒誹謗嫁禍造謠，藉此發作，挑撥離間國共合作的故技。

九、同陷冤獄

1942 年 12 月 2 日，我生下一個男孩。往年，粵北地區因有南嶺山脈擋住北方的冷空氣，即使在冬天，氣候也是溫暖的；但那一年冬天，不知為什麼卻特別冷，曲江還罕見地下了雪。我們所住的中賑委特派委員公署的房屋，沒有磚牆圍砌，是只用薄木板遮擋的臨時用房。門窗均有縫，寒風

不斷地從縫中吹進屋內，室內又不生火，住在裏面簡直跟冰窖差不多。我因在香港住了很長時間，已不適應這樣寒冷的室內氣溫，加之產後體虛，致高燒 40 ℃。志皋跟醫院商量，聘請了一位特別護士陸小姐來做家庭護理，照看我這個病中的產婦。

12 日那天，和往常一樣，志皋一早外出辦公，直到天黑還未回來，我在卧室內跟陸小姐談天。突然闖進三個不速之客，只聽見他們在卧室門外大聲叫嚷，説是要見陳夫人。陸小姐趕緊走到客廳裏對他們説：「陳夫人正在發高燒，不能見客，請原諒！」其中一人就高聲説：「我們是警備司令部的人，奉命來請陳夫人去談話的。」一邊説一邊就衝進卧室來了。

我一聽他們在客廳裏爭執，心知有變，立即拿起牀頭的電話筒，準備給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的夫人吳菊芳打電話。拿起話筒，才發覺電話線已被人剪斷了，知道果然出了問題。他們衝進來後，就大聲叫嚷：「我們司令請陳夫人去談話！」我説：「嗨！今天上午你們司令剛來探望過我，現在又有什麼緊要的急事，要我馬上去見他呢？請原諒我是個正在發高燒的病人，無法前去。如果真有急事要談，等陳委員回來後我告訴他，一定會讓他前去的，怎麼樣？」他們説：「不用了，陳先生已經在我們那裏了，正等着接你去呢！ 」我説：「好了，明人不講暗話，是不是陳委員已經被捕了？」他們獰笑着説：「一點也不錯，我們是奉命行事，不把你請了去，是沒法交差的。識相點，還是跟我們走吧！」我説：「既然如此，請你們派一個人先隨同這位陸小姐，去把賑委會公章印信和在銀行裏的公款存摺，當面點交給辦事處的出納組長張以璘先生，等辦完公事移交手續後，我再跟你們走。」他們覺得這是公事公辦，應履行移交手續，不好反對，就同意了。志皋後來知道這事，對我臨危不懼、沉着應變的態度十分欽佩，讚揚我頗有當年關雲長辭別曹操封金掛印光明磊落的風度。

護士陸小姐當即主動提出：「陳夫人是分娩不久的產婦，正在發着高燒。如果一路上無人護理，是會有生命危險的。我要陪她一起前去，隨時好有照顧。等到她退了燒，身體康復能下牀行走以後，我再回醫院去。這

是我做特別護士的職責所在！」來人開始不同意她的要求，後來聽他們三人悄悄地商量說：「上面說要抓活的，萬一路上出了問題，我們可負不起這樣重大的責任，不如就同意她陪同前去，反正一路上大家小心，嚴加監視也就是了。」於是總算表示同意了。這並非強盜發善心，而是要感謝陸小姐忠於職守、見義勇為、患難相助的崇高精神，使我在病中能得到她如此盡心負責的救護照顧，保住了性命。來人不由分說，用牀上的一條鴨絨被子裹住我的身體，外面再用繩子捆好，頭上給我蓋了一塊毛巾擋風，用竹牀抬我出門下山。陸小姐則匆忙攜帶了一點產婦和病號的必需用品，一路緊緊相隨而行。

這一抬，就直接抬到了曲江的火車站。我睜眼一看，見志皋已在那裏默然坐着。我倆四目對視無言，心知事已如此，說也無益了。當晚，就把我們押上一節加掛的特別車廂，開往湖南衡陽。衡陽與曲江雖然只相隔了一道南嶺山脈，氣候卻要寒冷得多。下車後，漫天大雪紛飛。他們僱了兩乘轎子，讓我和志皋分坐，陸小姐和押解的士兵們均步行相隨。也不知是我沾了志皋這位「委員」大人的光，還是他沾了我這個病中產婦的光，反正讓押解的犯人坐轎子，倒真是件罕見的事。路上的行人，還以為是迎接什麼達官貴人呢。

一行大概走了四五十里路，把我們送進了軍統特務設在衡陽城外的祕密囚禁所。在門口，他們要我下轎，我大聲叫嚷：「坐在轎子裏，腳都凍僵了，站也站不起來，叫我怎麼走路啊？ 」他們沒法子，只好把我用藤椅子抬進了牢監裏。看守所長是一個姓徐的，矮矮的個子，對我們很客氣。我一進去就大叫：「凍死我了，快點生火來！」他就真的很快送了個取暖的火盆來。

在獄中我們為什麼會受到如此的優待呢？說來無巧不成書，因為當時衡陽地區的軍警特務歸屬「忠義救國軍」管轄，而「忠救軍」司令周夔龍是黃埔軍校的第一期畢業生，論起資格來比戴笠還老（戴是黃埔六期，且中途退學）。他有一隻眼睛瞎了，人稱他「獨眼龍」。抗戰初期，他曾帶人

潛入上海租界祕密採購軍火，被租界巡捕房的人抓去關了起來。他的隨從部下聽巡捕房的人說，陳志皋大律師對從事抗日工作的人是很肯幫忙的，就來向志皋求助。志皋不但設法將他保釋了出來，還送給他可以一路暢通的難民身份證和三百塊錢的路費，使他得以安全離開上海回到部隊。從此，周把志皋看作大恩人。當他見到祕密逮捕志皋和我的命令後，就立即給戴笠打電報說，由他負責擔保，在衡陽就地監護，不要押到重慶去行不行。戴笠回電說，陳案事關重大，「上峰」不批准周的請求。周沒有辦法，遂將來往電報都給志皋看了，表示他已盡了最大努力，但上面的命令難違，他也無可奈何了，不過在此間的生活方面，他自然有權儘量給予優待照顧。

這樣，我們在衡陽獄中，雖然是兩個人分開來關押的，但吃飯的時候，卻可以在一起吃，伙食供應也很好，沒有吃什麼苦頭。因為每天三餐吃飯都能見面，我倆也就有了「串供」統一口徑的機會。我估計楊惠敏的事鬧得滿天星斗，轟動一時，很可能是軍統故意施放的煙幕彈；他們的主要目的，還是想調查我的關係，搞清楚我的真實身份，看看我究竟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是不是中共祕密的地下工作人員。因為我去重慶曾家巖謁見周恩來同志彙報情況時，坐的是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轎車，曾家巖周圍日夜都有國民黨特務在嚴密監視着進進出出的人，我很可能因此就落入了特務監視的「可疑分子」黑名單。

我悄悄地對志皋說：「關於我去過曾家巖的事，我可以說因思念宛氏遺孤，特意去曾家巖向中共方面詢問我和前夫宛希儼所生的大兒子宛昌傑的下落和近況。你只要說不知道我去過曾家巖『八辦』，讓他們以為這事我連對你也是隱瞞的，就行了。至於在上海和香港進行的抗日救亡工作，我是跟國民黨的左派元老何香凝一起幹的，愛國無罪嘛，他們也奈何不了我什麼的。」而在曲江賑委會時的工作，我在對張以璘同志和大弟伯沛等傳達恩來指示和中央的嘉獎時，就已特意關照過，對外決不能透露我們和中共方面的任何關係，只能講志皋派我去重慶是想辭職，去交通銀行。中賑委

的許世英、屈映光委員長對我們在曲江的工作是大加表揚的，因此都挽留志皋，不同意他辭職。

這樣，我們被捕後軍統特務們去盤問張以璘（出納組長）和我大弟媳張浩然（會計組長），要查志皋的賬時，他們的口徑統一，都說：賑委會曲江辦事處的一切開支賬目，都是嚴格按照規章制度，由特派員親自批發的，特派員批給誰，他們就發給誰，從來不知道特派員用賑委會的錢去接濟共產黨的東江游擊隊這回事……因為他們守口如瓶，嘴巴很緊，特務們查問了很久，也沒能查出什麼「通共」的把柄來。

在衡陽備受優待地囚禁了六個星期，獄方每周派人隨同陸小姐進城一次，採購產婦用的藥物和雞蛋、紅糖等營養食品。由於陸小姐精心地照看護理，我的身體恢復得很快，已能下牀行走，生活自理了。於是又被起解，乘火車去桂林，準備再轉乘飛機押赴重慶受審。

在火車上巧遇當初跟我父親在株萍鐵路當服務員的青年張福生，現已升任列車長了。乍見之下，彼此就已認出，但我對他以目示意，佯作互不相識，以免引起押送的士兵注意。晚上，他送茶水進來，我乘士兵不在身旁時，以手勢示意，向他索取紙筆。他隨即送來一張白紙、一支鉛筆。我像擬電報稿似的寫了幾句短語：「我和六哥因急病不日抵渝，盼你們及九弟和蔡老闆會同延醫診治。」下面署名是「六嫂淑儀」。又在紙上寫明，請張福生幫助，加上信封，用航空信郵寄給四川重慶青木關教育部李煥之先生（志皋的七妹夫）收。於是，終於突破了軍統特務祕密逮捕我們的信息封鎖。不久。田漢同志也在桂林的報紙上發表文章，公開質問國民黨當局：愛國人士陳志皋、黃定慧忽然失蹤，究竟到哪裏去了？戴笠是最惱怒被人揭穿軍統特務祕密逮捕囚禁社會知名人士的卑劣行徑的。他得知我倆被捕之事已被公開捅破，成為社會上許多人關注的一起政治風波，自然十分惱怒，但紙已包不住火，再也無法隱瞞掩蓋了。

陸小姐陪我們同行到桂林，直到在機場送我們上飛機，才依依道別返回曲江。我熱淚盈眶地緊握着她的雙手，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她那見義勇為

的高尚醫德，終於從死神手中救回了我的生命，這種非常人所能做到的大仁大勇大恩大德，豈是一個「謝」字所能表達得了的。我還寫了一張紙條，請她面交張以璘同志和我大弟夫婦，要他們支付給陸小姐四十二天的雙薪酬金，並對她說：「你的恩德，不是這點薄酬可以報答得了的。你的正義感情和高尚友誼，我將永遠感念在心。但願今後還有再見重逢之日。」只可惜別後至今，與她一直未能有重新相見的機緣了。

我們被押解到重慶後，祕密關在軍統特務的望龍門看守所。在望龍門看守所囚禁期間，志皋有幸和葉挺將軍同做囚友。葉挺將軍過去在戰場上曾揹着受傷的蔣介石下山，蔣令人示意希望葉挺歸順。葉對來人說，如蒙不殺而開釋，一出獄門即奔回曾家巖「八辦」報到。葉挺將軍堅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不屈的鬥爭精神，使志皋深受教育。

蔡叔厚神通廣大，與軍統骨幹王新衡友善。王曾受蔡叔厚之託，來望龍門看守所看望過我一次，並送我一本《金剛經》和十本黃紙簿，以及毛筆、朱墨、小硯池等文具，囑我靜心抄經，切勿急躁，說外面的朋友們正在設法營救中。他又關照了看守所中有個叫王玉坤的山東人，特意安排他為我們送飯、傳送小說（犯人閱讀非政治性的小說是允許的）和對外通信。信由他送到駱劍冰家，再轉給有關人士。志皋就在《秦漢演義》等小說書上，對某些字句用鉛筆劃上圈圈或叉叉，傳給我後，再把有關字句串聯起來組合成文，這就是我們獄中的祕密通信方法。

我和志皋在獄中暗中的串供內容，除了在衡陽時已商量好去重慶曾家巖「八辦」的理由之外，還設想到敵人可能會追問我在上海時同「風雨書屋」、《每日譯報》的關係等問題。《每日譯報》是公開出版發行的，我以通易公司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的身份資助《每日譯報》也是眾所周知的事，無法否認，只能以支持抗日救亡宣傳、愛國無罪來答辯。但「風雨書屋」對外並未公開過，如若問起，只能堅決回答「不知道」了。至於胡蝶夫婦「行李」丟失一事，乃是我們被捕的導火線，少不得應予抗辯，從不宜過多樹敵的策略考慮，不妨回答說：我們認為胡蝶本人確是此事件中的受害

者，但這是誰也負不了責的意外損失。我們是賑委會的工作人員，接受任務接運護送各界人士從香港向大後方撤退，又不是收費營業的保險公司，哪來賠償損失的責任呢？

至於我的真實身份，早在最初受命從事白區工作時，黨組織即有指示：如萬一被捕，就堅持說在北伐國民革命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曾參加過中共，但後來已脫黨，失去任何聯繫。這就可以杜絕敵人追問上下左右的領導隸屬和組織關係。而陳家弟妹親友，也確實不知我是地下的共產黨員。志皋認為我的這些分析和答辯合情合理。他是沈鈞儒大律師的高足，應付敵人的審訊自然比我更有把握，故此我亦深信他定能經受得住敵人審訊的考驗。

在審訊時，我倆的串供果然很有效。特務們首先發話：「我們早已知道那天你去過曾家巖『八辦』，你所乘坐『八辦』小車號碼我們都記下了，諒你也不會抵賴此事。你必須坦白交代，為什麼去曾家巖？周恩來對你有什麼指示，給予你什麼新的任務？」我就從容地按照早已準備好的口供對答，說是為了探詢先夫宛希儼遺孤的情況，瞞着陳志皋前去的。他們當然不相信會如此簡單，怎奈我咬緊牙關堅不吐實，審了半天也問不出別的情況，於是又突然轉過話鋒說：「你所支持的上海《每日譯報》編輯部裏，窩藏着不少中共黨員，所以該報盡是登載些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報，這是為『異黨』作宣傳，難道沒有罪嗎？ 」我回答說：「報紙是人民的喉舌，愛國無罪，對於前線抗日的戰況理應有聞必錄，告訴廣大讀者，鼓舞抗日士氣。對於謝晉元將軍率領八百壯士在上海四行倉庫孤軍浴血奮戰抗日，以及山東戰場上的台兒莊大捷，所有報紙都是大大地宣傳報道過的嘛！為什麼八路軍在平型關狠狠打擊了日本侵略軍就不能報道宣傳呢？如今不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時期嗎，我們這樣做有什麼罪呢？至於你們說報社編輯部裏有中共黨員，他們的臉上又沒有貼着共產黨員的標誌，我怎麼知道呢？」他們又獰笑着轉換了話題說：「好啊，你真有本事，居然能騙到杜月笙先生的錢投資入股來支持你們呢。」我說：「杜先生是地方協會的會長，那些錢是地方協會的，不是杜先生個人的。動員他投資支持抗日宣傳工作，是愛國行為，又何罪之有？不但杜先生無罪，我們也是無罪的。《每日譯報》上登載中國抗日前線打了勝仗的消息，不但振奮國內的人心，連和我們共同抗擊法西斯侵略戰爭的英美法外國友人們也都高興，不高興的只有日本侵略者和漢奸賣國賊，你們怎能說我有罪呢？」他們惱羞成怒地斥責我說：「你還敢狡辯！日本人的情報說，你們是偽裝愛國人士去竊取情報的中共特務。」我不禁笑着反問：「這不是笑話嗎？你們又不是漢奸賣國賊，怎麼會這樣相信日本人冤枉愛國者的話呢？」我面不改色地侃侃而談，駁斥得他們啞口無言，幾乎下不了台，最後只好向我怒吼一句：「你不要嘴硬，我們會深入調查的……」第一場審訊就此草草收場了。

我被囚禁在望龍門祕密看守所內二樓的一間房內，可以眺望到嘉陵江兩岸的風景，此時自然無此閒情雅趣欣賞風景。閒時就用王新衡送的黃紙簿抄寫《金剛經》，硬是把十本簿子都抄完了。軍統特務在這裏羅織罪名，殺人不眨眼地祕密逮捕和殺害了許多愛國人士以至無辜羣眾，半夜裏經常會聽到他們殺人的槍聲，不知有多少地下工作者在這裏遇害。身處這樣的魔窟裏，對於個人的生死安危，也就置之度外了。

在望龍門看守所時，還有一件小事情不妨順便提及：一次，那個山東人王玉坤給我送來一包大頭菜，內附一張用鉛筆寫的小字條，署名為「葛修鑾之兄」。字條上只寫了：「昔日階下囚，難忘開釋恩，善自珍重吧，不日有好音！ 」我想了一陣子，才記得葛修鑾是我二妹在漢口二中讀書時的同學。北伐軍佔領武漢後，人民法庭公審勾結北洋軍閥的戰犯，葛家的人因與軍閥王占元有親戚關係而被捕受審。當時，劉伯垂是主審的大法官，我是章蘊派去代表婦女部任陪審員的。章大姐吩咐我，根據黨的政策，對主犯從嚴，脅從不究，不擴大，不株連無辜。所以在審問中，我們對那些只是因親戚關係而並未參與戰爭犯下罪行的人，在查明真實情況後，均判無罪，予以取保釋放。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當年被我們無罪釋放的「葛修鑾之兄」，那時已是軍統的內勤工作人員，因為聽說我們即將被轉解去軍人